

时兴国 管之江 译
缪勒女性侦探小说系列

Mary Muller

玛丽·缪勒
女性侦探小说系列
世界畅销书
第一

街头枪击案之谜

When I left Berkeley, I didn't feel like going back to the office; only routine chores awaited me there, and I was primed for more active pursuits. So I decided to drive over the Richmond Bridge to Marin County and pay a call on Mia Taylor.

"These are the kind of books you don't ever want to end . . . The words Muller uses to convey the stark beauty and desolation of the area are worth a thousand pictures, and the people who inhabit her books are finely drawn."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版社

世
南
典
销
书
金
库

街
头
枪
击
案
之
谜

列

责任编辑：项纯丹

封面设计：官 超

①TROPHIES AND DEAD THINGS

②Copyright©1990 Marcia Muller

③本书由美国Warner Books, Inc授权出版，
版权所有，不得翻印。

〔美〕玛西亚·缪勒 著
街头枪击案之谜
叶兴国 管之江 译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 经 销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960 1/32 印张 6.5 插页 2 字数 118,000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— 10,000 册

ISBN7-80511-922-8/I · 209

定价：7.00 元

前 言

在西方,侦探小说历来以男性占优势。不仅侦探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多半为男性,小说所塑造的主人公——侦探,也基本上是男性。至于女性,往往以受害者或男凶犯合谋人现身在作品中出现。虽说一个多世纪以来,古典侦探小说和现代硬派侦探小说中,也曾出现过少量女侦探,如30年代英国著名女作家阿加莎·克里斯蒂笔下的乡村女侦探马普尔小姐、50年代美国作家吉·菲克林所塑造的私人女侦探霍尼·韦斯特。但是,即使这两位比较有影响的女侦探,她们的形象也都没有脱离男性附庸的窠臼,因而没有能够像许多成功的男侦探形象那样,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。

1977年,美国女作家玛西亚·缪勒的处女作《埃德温铁鞋》出版了。这部描写某古玩店凶杀案的侦探小说的主人公——莎伦·麦科恩,以独立于男性之外的全新面貌出现在侦探小说领域。她既有超越一般女人的杰出才能,又有普通女人的七情六欲。面对这样一个活生生的“现代女骑士”,读者的神经一下子被牵动了。霎时间,《纽约时报图书评论》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

赞扬文章，大西洋两岸响起一片叫好声。一批又一批女作家闻风而动，紧追玛西亚·缪勒，创作以莎伦·麦科恩为模式的女侦探系列小说。从而，在本世纪最后20年掀起了当代女侦探小说浪潮，把西方侦探小说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玛西亚·缪勒，则是这个新阶段的开拓者。

玛西亚·缪勒，1944年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。她18岁入密歇根大学，先后获得英语学士和新闻硕士学位。毕业后，她推销过杂志，担任过政治经济著作评论员，还当过自由撰稿人，但她的兴趣始终是侦探小说。1977年，她尝试创作女侦探小说，并一举获得成功。在这之后，她和后来成为她终生伴侣的当代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比尔·普龙兹尼一起编纂女侦探小说作品集和论文集。1981年起，她从事专业创作，迄今写有莎伦·麦科恩和埃琳娜·奥利弗雷兹这两位女侦探的系列长篇小说二十多部。这些小说均为畅销书，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。1993年，她荣获美国私人侦探小说作家协会颁发的终生成就奖。翌年，她的小说《阴影中的狼》又获爱伦·坡最佳犯罪小说提名奖和安东尼·鲍彻奖。目前，她仍处在创作的旺盛时期。

就玛西亚·缪勒的作品分析，莎伦·麦科恩这个人物的塑造大致分三个阶段。一、《埃德温铁鞋》及80年代初问世的《对这些长片打问号》、《柴郡猫的眼睛》、《驱逐黑暗的游戏》等作品描述了她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。莎伦·麦科恩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个

普通家庭，具有八分之一的印第安人血统。起初她在百货店工作，不久调到保安部门。嗣后，到伯克利大学攻读社会学学士学位，并经过几番周折，又恢复原先的行业，在旧金山一家最大的保安公司当职业侦探。她选择这个工作，完全是出于个人爱好和维持生计。最后她看中了颇有自由氛围的众生法律事务所，在该所长期担任职业侦探。她工作勤勉，不畏劳苦，法律观念强，乐于与警方合作，凡是接手的案子都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她单身未婚，但也结交性伙伴。她的爱情观是建立在女权主义基础上的。二、接踵而来的《白衣骑士》、《刀光剑影》、《黑星》、《变本加厉》、《风眼》等作品赋予了莎伦·麦科恩新的案情和新的遭际。在此期间，她个性最大的变化是增强了对侦探工作的道德感和使命感。她每每为身不由己地卷入复杂、危险的案情而感到懊悔，但又无法割舍对受害者的同情。结果，只能强迫自己接受一个又一个挑战。在侦破技术上，她也比以前更加成熟。不管她的对手作案手段怎样高明，但还是在她手下原形毕露。三、就是此次翻译出版的作品：《街头枪击案之谜》、《图发湖的秘密》、《鸽房女尸案》、《阴影中的狼》、《爱之祸》。这五部小说均于90年代出版。如果说，以前的作品着意刻画了莎伦·麦科恩的成长和成熟，那么这一阶段的作品则特别强调莎伦·麦科恩的大智大勇和坚强不屈。在这些书中，这位带有女权主义烙印的“现代女骑士”活动场景不受局限，案情时间跨度很大，案情本身也极其复杂、极其危险，因而人物形象也更显生动

丰满。

毫无疑问，这时的玛西亚·缪勒在创作上日臻成熟。她对侦探小说的结构布局和情节设计驾轻就熟。她频频让主人公置身于险象环生、孤立无援的境地，使作品充满了紧张的悬念。人们往往会跟随主人公身临其境、跌宕起伏，直到最后案情真相大白，才会轻松地舒一口气。然而，人们始终不会觉得莎伦·麦科恩是个“超人”。这正是玛西亚·缪勒超越一般侦探小说家的高明之处。除此之外，这些作品的社会容量也明显加大，从而增加了思想深度。在阅读、欣赏这些书时，人们无疑会感受到50年代美国当局围剿进步势力的恐怖，也肯定会领悟到70年代美国民众反对越南战争的心绪，而且对于当代美国存在的暴力、婚姻、环保、移民和企业危机等诸多社会问题，也会有所深思。正如玛西亚·缪勒本人所说，她写侦探小说不是纯粹给人消遣，而是试图运用这种众所喜爱的小说样式，通过女主人公一系列曲折经历，反映当代美国的若干社会问题。

介绍当代西方女侦探小说系列及其代表作家玛西亚·缪勒，在中国大陆是首次。由于这次推出的小说是这位代表人物在西方最有影响、最热门、也最为流行的力作，读者一定会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，并通过它对当代西方女侦探小说有所了解。当代西方女侦探小说是当代西方通俗文学的主要支柱。引进这方面的优秀作品，对我国通俗文学的发展、畅销小说的创作也是个促

进。为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、为繁荣我国文化尽一份绵薄之力，也是我们翻译这套系列小说的初衷。

黄禄善

1997 年元月于上海大学

夏季的早晨,旧金山总是被浓雾所笼罩。浓雾涌过金门大桥,悄无声息地弥漫到市区,把一切景物幻化成美丽的、神秘的有时甚至是邪恶的东西。浓雾又从门缝泻入室内,渗入即将醒来的人们的意识。于是,处于恬静睡眠状态的人开始辗转反侧,令人愉悦的梦境变成了令人恐惧的梦魇。浓雾的受害者一睁开眼,甚至还没有面对阴沉沉的天气,就已感到心情压抑。

六月的一个星期六早晨,我也是这么一个受害者。没等闹钟响,我就醒了,躺在床上注视着卧室角落里的阴影。后来,我伸手转动小百叶窗的开启拉杆,坐起来,看见迷雾像天使的头发一样披挂在后院松树树枝上。

我叹了口气,摒除残梦的纠缠,把注意力集中到即将开始的一天。这一天的前景也不太令人振奋。我的老板众生法律事务所资深合伙人汉克·赞恩要我办件事:帮他腾空一个委托人的房间。最近发生了一连串的街头枪击事件。他的委托人在其中一次枪击中被杀。虽然,我并不喜欢这样来度过星期六,但还是答应了汉

克，因为汉克是我多年的老朋友，是个有趣的伙伴。而且他还向我行贿，答应请我吃午饭。

门铃响了，我开始感到不安。当门铃或电话铃在不适当的时候响时，我总会感到不安。我起了床，抓起睡袍，边朝客厅走去边用带子系好睡袍。到了门边，我从窥视孔朝外看。

一个月以前与我经常见面的吉姆·爱迪生站在台阶上——他喝醉了。早晨7点刚过，他就醉了。我开了门盯着他看，吉姆斜依在门廊的栏杆上，蓝眼睛闪着一丝狡猾的光芒。他蓬头垢面，衣服凌乱，嘴里发出浓烈的烟味。

他说：“我参加了通宵爵士音乐会。”吉姆是爵士音乐钢琴手，周末随一个乐队在靠近海滩的一家小型俱乐部演奏。“我能进来吗？”

我迟疑了一会儿，心里盘算着要多久才能摆脱他，然后决定迁就他才是上策。

“进来坐一会儿吧。”我让他进来，领他经过客厅到了厨房。我走到了咖啡壶边往里灌水。他直接走到冰箱边打开冰箱门朝里看。

“有酒吗？”

“架子上有半瓶雷斯林。”我一只手磨咖啡豆，伸出另一只手从碗橱里拿出一只玻璃杯递给他。当我的一天开始时，吉姆的一天才结束，我已习惯了他的这种生活方式，不过他很少到这时候才回来。

我煮了咖啡转过身来，看见他站着手里拿着空酒

杯，双眉紧锁。“你恨我，是吗？”他说。

我叹了口气。“恨你干吗？”当初我对他说我再也不想见他时，他就问过这个问题。打那以后，他不停打来无数个电话也问这个问题。我的回答是真的，虽然我早就用不着他相信我。吉姆是个好人，很有幽默感，做为一位音乐家，他富有热忱和才能。我很喜欢他。事实上，我是因为喜欢他才决定不再与他保持关系的。利用你喜欢的某个人来忘却你所爱的另一个人，这种做法是残酷的。

看了我一会儿之后，他开始扭动嘴唇。“还像从前一样聪明睿智，是吗？”

“什么意思——”

“你总是对的，你总是知道什么对我最有利，什么对你最有利，什么对他妈的整个世界最有利！”

“你错了。”如果我那么聪明睿智，我还会让自己继续去思念一个我已六个多月没听到音讯的男人吗？我当初会让自己爱上那个男人吗？

吉姆把酒杯往桌上一扔，把酒杯摔破了。我瞪大眼睛看看闪闪发光的碎玻璃片，又看看他怒气冲冲的脸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发脾气。

“我说什么才能让你明白？”他问。

“这一切，我们已经说过了。”

“不，我不这么想。还没有，我们没说过！”突然他转过身朝大厅走去，打开前门，出去后砰地一声关上了门。

“妙，”我说，“太妙了。今天还会有什么糟糕的事发生？”

我长长地吐了口气，倚靠在酒柜台上。咖啡滚了，在我背后冒着汽。我想，这个愤怒的吉姆是否有施行暴力的潜在本质。唉，我想我们都有，难道不是吗？他接下来会做什么？我只好等着瞧了。我怀着沮丧的心情开始淋浴。洗头时，我想起了昨晚的梦。我开车到汉克的委托人位于瑞希蒙德内区的住房去和汉克见面。当我驶过布韦纳高地下坡朝黑什伯里驶去时，发现金门公园边上朝北的那条街不见了。我糊里糊涂地转了几个弯，但越开周围的环境越陌生，突然我又到了山顶。我一次又一次驶向黑什伯里，但就是开不到斯坦延街。

我很迷信地暗暗祈求，但愿这场梦不是一个凶兆。

9点钟时，我已喝了三杯咖啡并且做了《纪事报》上的填字游戏，情绪好了些。当我到达瑞希蒙德内街时（斯坦延街仍然在那儿），我心情已好多了。

瑞希蒙德内街地处金门公园的西北面，是中产阶级的居住区，独家小院和多层楼房鳞次栉比。这里过去曾有许多俄罗斯人和爱尔兰人居住，但在过去的20年里，已经成了事业成功的亚裔居住地。格里大街上的天主教教堂、爱尔兰酒吧和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仍然还在，但新居民的迹象已随处可见。

当我沿该区商业繁华地段克来蒙特街行驶时，在两个街区看见了八家亚洲人开的餐馆：一家泰国餐馆，一家日本餐馆，一家缅甸餐馆，两家越南餐馆，还有三

家不同菜系的中国餐馆。我见到的行人中十有八九也是亚裔，和那些餐馆一样也反映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亚洲民族。他们中既有手推购物车、体态佝偻的老人，也有驾驶日本跑车的年轻夫妇。我认为克来蒙特街完美地体现了旧金山变化着的文化模式。

不幸的是，它也是这个城市交通最坏的典型。建造这个地区时没有一个人预料到今天会有这么多的车辆和人口，结果停车场和车库实在太少。幸亏汉克告诉我，如果我找得到第三街那幢房子，就可以把车停在那幢房子的私人车道上。

我在第三街转弯处找到了汉克告诉我的地点：两层楼房中的一幢，这幢楼的门面有着走了样的维多利亚风格，翠绿色的墙上有淡紫和橘红的装饰——稍有审美情趣的人就会被这种搭配吓退。汉克的本田车停在私人车道上。他站在车旁，嘴边布满了绷紧的线条。当他取下骨质镜架用他紫红色灯芯绒衬衫的下摆擦拭厚厚的镜片时，我看见他的眼睛很忧郁。汉克很关心他的委托人——或许太关心了，以致在处理他们的问题时不能保持冷静。

我温和地朝他笑笑，随他进了门。房间里有点冷。一条很窄的走道一直通到楼房的另一头；走道的尽头有一扇门，我看见里面有一张餐桌和一只冰箱。左边是一个小起居室，起居室的凸窗俯瞰那条街。我走进起居室，开始脱仿麂皮皮茄克。接着我迟疑了：穿着茄克衫搬箱子和家具会把衣服弄脏，不穿又会感到太冷。

汉克说：“我已经在煮咖啡了。你可以穿伯里的羊毛衫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跟着他经过大厅，进了比起居室更小的卧室。他在双人床上的一堆衣服里寻找，然后扔给我一件肘上有个洞、右袖口散了线的深绿色羊毛开衫。我穿上它，长至膝盖；我把袖口卷到手腕处。那个死去的伯里·希尔德利是个大个子。

汉克去了厨房。我四处走走，发现屋里没有任何家具，只有印了“贝金斯”名字的纸箱。我接过汉克递来的一杯咖啡，疑惑地扬起眉毛。

“这是几年前伯里离婚后搬过来的东西，”他说，“他不是一个重视家庭生活的人。我猜想做会计的人从来不会顾家。”

汉克时常会有这种总结性的言论，其实只是些缺乏或根本没有事实根据的大胆设想。

我走到冰箱边去看一张用一块磁铁粘在上面的彩色快照。照片上有一个瘦长的男人，金色的髻发，戴一副老太太们戴的那种眼镜；穿一件奇安特汗衫，两个衣着相同的白肤金发的男孩站在他的左右，身高只到他的腰部。

“这是希尔德利，对吗？”

“这是从前照的；他的孩子现在已十几岁了。”

我更加仔细地察看。他被枪杀的第二天早上《纪事报》刊登了他 1965 年拍的照，看起来这张照与那张照没什么不同。当然那时他留长发，头发蓬乱地往后梳。

伯里·希尔德利是60年代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自由演讲运动的创始人之一。当时，尽管我仍在上中学，但我对大学校园里正在变化的思想倾向很感兴趣，并羡慕我的兄弟姐妹和其他学生公然向权威挑战的行为。我对希尔德利的印象有点模糊，但我记得在抗议活动的电视报道中曾看见他在边缘地区闹事。

汉克问，“你认识他？”

“有点认识。”

“你怎么会认识他？你那时还是个小孩子。”

我笑了。汉克只比我大六岁，但他总是以一种家长式的态度对待我。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我们在伯克利相识时（那时希尔德利已退出政治舞台好几年），他是一名厌世的、经历过越战恐怖的法律系学生，而我只是一个普通大学生，上大学之前曾在百货商店打工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的厌世情绪比汉克更加强烈。但他坚持认为他必须关心我并给我引路。我们之间的友谊从未受到感情纠葛的危害。

“我仍记得他，”我说，“尽管他从未像马里奥·塞维奥那样被新闻媒体关注过。”

“像马里奥那样具有领袖气质的人只是凤毛麟角。伯里的滑稽风格有点像艾比·霍夫曼的风格，但不那么令人讨厌。”汉克的笑容有点怪兮兮的，他已在缅怀往事。

我知道他正在想什么。像马里奥·塞维奥那样的空想家曾俘获了一代人的想象力。那个马里奥在1964

年秋季的某一天，恭敬地脱掉鞋子，爬上被三千多名学生包围的警车车顶，夺过麦克风，与人群中的其他人进行了一场长达 30 小时的对话，抗议政府在加州大学逮捕民权活动分子。伯里·希尔德利并没有给马里奥·塞维奥耀眼的光芒再加上一根火柴，他给一场没有幽默感的政治运动带去了幽默，并从伯克利消失了。有人说他们转入了地下。后来希尔德利成了一名会计师，而且许多年之后，在他寓所附近发生的一场毫无意义的街头枪杀中死去。

我对汉克说：“60 年代你还是斯坦福的大学生，你怎么会认识希尔德利？是不是以后才认识的？”

“是的。1970 年我在越南遇见他。伯里被赶出加大后开始为一家左翼刊物工作。为了报道越战，他去了越南。但他到了越南不久，那家刊物就停刊了。我遇到他时，他和一户人家住在金兰湾附近。他有个男孩，是他和这家的一个女儿生的。没有美国人作伴，他感到寂寞。所以他和我们这些基地军人一起泡在一家酒吧里，谈论越战和美国发生的事情。后来他的老婆和儿子被迫击炮弹炸死了。伯里立即返回到了加利福尼亚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汉克耸耸肩。“他进了旧金山州立大学，拿到了会计学位。再结婚，又有了两个儿子。大约十年前又离了婚，独自一人住在这套公寓里。他在格瑞街和二十二街工作，为一家税务公司干。”

“你怎么会成为他的律师的？”

“五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我和他在邱吉尔酒馆邂逅。我立刻认出了他。那次见面之后，他为了法律上的小事来找我。从此，我们开始相当频繁的见面，地点总是在邱吉尔酒馆。”

“你们是好朋友吗？”

“说不上是，你问这干嘛？”

“我在想，他怎么会成为一个会计师，怎么会以这种生活方式生活。”我指了指相当传统朴素的厨房，“这与他过去的生活方式不符。”

“是的，是不符。但我几次问起他这个问题，他都把话题岔开去。”

“你们通常谈论什么话题？”

“谈论我的工作。谈论众生法律事务所。他对低收费法律服务很感兴趣。谈论体育活动，他是巨人队的球迷。还谈论从前的电影，他从前看过很多电影，大部分是三四十年代拍的电影。但是我觉得他不愿谈论任何涉及个人的事情。”

“什么事情使他变成那样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也许是他在越南的经历造成的。不过那时他还不很自我封闭。只是如果有人说起伯克利的往事，他就会突然借故离开。”汉克看了看手表。“就说这些吧，眼下我们最好加紧干。房东太太打算星期一开始让人来看房子。”

我喝完咖啡站起来。

“你把起居室内的书籍、录像带和其他玩艺儿装